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2022年6月：67-69

DOI: 10.6962/MJHSS.202206_11(1).0006

书评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语言研究》

The Sociolinguistic Studies on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王晓梅，《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语言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ISBN: 978-7-100-19389-4

林素卉*

(LIM Su Hui)

华侨的生存、生活往往是华人本身关切的议题，支撑着华人在海外发展与身分认同的是民族文化的根，而用以承载民族记忆的是语言文字，这也是为何海外华人特别重视母语教育的原因。在较早以前，华人对于语言传承的焦点多集中在华文教育，对于方言的发展普遍来说是任其自然，而邻国新加坡曾有一度为了消灭籍贯族群之间的隔阂而推广华语，打压方言，于之比邻的柔佛州沿海一带也受到了这种政治宣传的影响，方言急速衰退。在如此“放任”和“打压”的语言环境之下，方言的生存空间受到挑战，遂有学者开始关注华人的方言课题。

目前海外华人汉语方言这一研究多属于逐点小规模的调查，缺乏较大层面的介绍和概括，针对这一空缺，王晓梅2021年《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语言研究》算是对学界数十年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指出了华人语言未来发展的趋势。这部著作的特点是从宏观到微观，从历时到共时，通过整体马来西亚大环境看语言资源及内部竞争，以特殊词汇看语言接触及文化兼容，介绍历来语言政策对整体国家语言的一线发展，同时在多元族群文化影响下于语言景观上又能大放异彩。

这部著作令人惊喜的是，除了介绍我国华人的语言概况以外，更进一步分析了马来西亚各个语言资源对于国家内外的价值，并点出历来语言政策失利的原因。然而可惜的是我国族群语言涉及过多的政治和经济考虑，即便是华人内部也存在许多分歧，王晓梅虽然对华人语言规划提出多项可以考虑的要素，但大多比较倾向于理想，能够配合施行的单位有限，如提到媒体可培养大众的语言意识，激发大家对族群语言（方言）的思考与反思；华社应考虑华语及方言在世界经济的价值；政府应推广各族群语

* 林素卉博士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电邮地址：suhui.lim@newera.edu.my

言等，这些建议都非常具体，并且也是致力于语言推广保护者的心声，然而实际该如何操作，是否有具体方针，由谁来领导才是真正的未解之谜。

这本书可说是一部综合性著作，其关照面相当的深与广，每一篇章可以各自独立，又可连成一线。一般而言东南亚多元族群所构成的特殊语言现象为国外所好奇，而国人对自己本国的语言情况虽熟悉，但实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王晓梅的章节安排有助于国内外读者从外围开始了解我国的语言概况，并且从语言政策和多元族群的环境了解语言生态的形成，接着从传播的角度理解内部不平衡发展的原因，从不同场域对语言的选择则反映了华裔在身分上的多面向认同。此书将马来西亚复杂的语言现象以几个区块分别论述，在议题上显得深入，而整体结构框架清晰明了。

语言发展走势除了来自政治因素，用户的语言价值观也会直接影响语言未来的发展。王晓梅将量化统计及深入访谈的研究方法投注在调查中，在他以前，鲜少有学者对我国华人语言做数据化的普查，因此对于华人的语言态度主要来自于印象。王氏于二十年间陆续在柔佛、霹雳、檳城、雪兰莪及吉隆坡展开调研，并在檳城浮罗山背对客家天主教徒做深度访谈。其调查研究方面采取共时纵横比较，包含不同地区同一籍贯方言的比较、同一地区不同籍贯的比较，并同时参考邻近国家的发展趋势。

王晓梅的调查结果基本上与我们对马来西亚华人语言态度的印象符合，华人族群对于籍贯身分认同正在转移至大华人群体的集体认同。这其实是全球汉语的发展趋势，通过教育的普及与媒体的发展，汉民族在语言上逐渐成为共同体，即以普通话为主体的汉语认同。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反映语言之所以在同一国家不平衡发展的原因是由于各地区语境的差异，影响因素在于籍贯人口的比例、媒体渲染、语言场域等，如柔佛南部华语普及化速度比其他地区更快的原因主要来自新加坡媒体所推广的华语运动，而当地福建闽南语转移为华语的速度最慢是由于人口数占比最多，其次是方言的使用目前主要只存在于非正式场合的公共领域（如咖啡店），而正式场合多以华语代之，这显示了方言使用空间正在缩减。王氏的研究数据为我们厘清了每种导致语言变化的因素对结果所产生的变项关系，使我们可以预期马来西亚各籍贯方言在各地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结果。

然而比较可惜的是王晓梅的调查数据距今比较久远，像柔佛地区的调查距今已将近二十年，较新的雪隆一带调查也在2013-2014年，对于檳岛浮罗山背的调查也在2012和2015年。而我国智能型手机的普及化和本土华人因中国一带一路政策而与中国产生更深的连结大约至今只有五、六年，短短几年内华人对于国际观、语言价值观的变化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有必要在近年内针对华人语言价值观进行普及调查，以比较前后差异。另外则是调查点应更为广泛，王氏的研究主要在于几个华人较为集中的城市和聚落，并且只限于西马的柔佛、雪隆、檳岛，对于东马地区完全空缺，而西马也还有许多值得调查的地区在学术上至今仍是空白，若能将这些空白补上，就有机会比较华人聚落与非华人聚落之间语言转移的差异。

这部著作的另一亮点在于语言景观的研究。在王晓梅以前，本土华人语言的研究多在于使用的话语本身，即正在使用的语法、词汇及语音，对于能够反映语言的景观则没有相关探讨。王氏通过拍摄华人新村、唐人街和小印度的招牌作为研究数据，从招牌上单语到多语的选择、语码夹杂、文字繁简或俗体字等几个面向去分析华人和印

度人的身分认同差异。同时在一些老照片上发现华人招牌历时的变化，反映着政治变迁对招牌语言使用产生的影响，即汉语与英语的招牌在我国独立后逐渐变换成汉语与马来语的招牌，而其中不变的是大部分华人（唐人街具有华文的招牌占70.88%）都会在招牌上凸显业者的华人身分。另外有趣的是华人族群与印度族群的招牌多呈现多语并列的情况，即招牌上会同时显示自己的语族认同、国族认同、国际认同，这是他国所无法见到的特殊景观。

除了大方向与宏观的语言生态考察，王晓梅对我国细致的语言现象也有敏锐的嗅觉，他从单一外语词“安娣”的借用到该词语意的变化来分析出马来西亚式华语有别于中国规范化汉语的发展，充分显现我国华语的独特性。另外考察本国华人惯用语“做么”的历史来源，对比古代文献、北方方言及南方方言，推论这个语法特殊的词应是来自南方方言的变体。

整体来看，王晓梅这部著作作为我们整合了数十年的马来西亚华人语言研究，同时也带领我们思考可以进一步探究的课题，使我们认知到本土华人语言的研究仍未枯竭，而是可以有更多新的展望。